

## 齊氏文化基金會

### “推動中國進步獎” 頒獎一覽



### 第三屆 (2010,8,15.)

獎予中國獨立製片人林鑫和他的紀錄片《三里洞》  
澳大利亞齊氏文化基金會主辦—台灣福陞文教基金會協辦  
2010年8月15日，台灣台北

### 頒獎議程

主持人宣佈開始 (1 分鐘)  
致詞—黃重生 (2 分鐘)  
齊氏文化基金會介紹—齊家貞 (5 分鐘)  
頒獎辭宣讀—阿木 (3 分鐘)  
播放獲獎作品——三里洞影片 (19 分鐘)  
三里洞影片講評—張鳴 (10 分鐘)  
頒獎—王健壯 (10 分鐘)  
得獎人獲獎感言——翰 光代 (10 分鐘)  
頒獎典禮結束，餐會開始，自由發言

(一)

時 間： 2010年8月15日 (星期天) 7: 00—9: 00 pm

地 點： 臺灣，臺北君悅大飯店

主持人： 龍應台 (王健壯代)

工作人員： 黃重生、阿 木、簡昭惠、汪師東、齊家貞、李應平

來 賓： 崔衛平、周素子、蔡詠梅、武宜三、高 健、余世新、阿 森、梁寶洪、Mona 宋  
廖志峰、馬 修、翰 光

### (二) 分工及聯繫方式:

聯 絡： 黃重生 (臺灣福陞文教基金會)，電話：886 2 2719 7277

李應平 (龍應台基金會執行理事)，電話：886 2 3322 4907

齊家貞 (齊氏文化基金會) 電話：613 8502 7499; 61 430 645 307

統 籌： 阿 木、簡昭惠、汪師東 (齊氏文化基金會)

宣 傳： 蔡詠梅 (香港開放雜誌責任編輯)

武宜三 (香港五七學社召集人)

阿 森 (獨立中文筆會會員)

### (三) 注意事項:

來賓 8月14、15日白天參加龍應台基金會舉辦的“聚焦中國”活動。海外來賓請於8月13日 (星期五) 到達臺北，需接機者請聯繫黃重生。16、17日臺灣兩日旅遊觀光，18日中午退房後自由活動。

## 頒獎辭



齊氏文化基金會決定將 2010 年第三屆“推動中國進步獎”頒給中國獨立製片人林鑫和他的紀錄片《三里洞》。

林鑫，一個煤礦工人的後代。他舉辦過個人畫展，出版過詩集《噢！父親——黑色的記憶》。2003 年，他“在內心的驅動下不顧一切地借了攝像機”開始了他業餘獨立製片人的生涯。他把歷盡艱辛拍攝出來的紀錄片稱為“我精神的產兒”。

林鑫的第一部精神產兒是《陳爐》，然後是生存三部曲：《三里洞》、《同學》、《瓦斯》。

當林鑫懷著沉重悲涼的心支起他的攝像機，挖掘深埋在陝西煤窯裏他父輩們沉重悲涼的過去時，那些熱烈響應“支援大西北”號召，從上海來到陝西的 318 名青年人，活下來不到 20 人，其中絕大多數懷著曾經的夢想長眠在黑色煤城地下。林鑫的攝像機忠實地拍下了两个逝者和十三个倖存者，他們在影片裏留下了名字、面孔、以及內心深處的黑色記憶和對時日無多的歎息。至少，由於《三里洞》，這些人不再被以為不曾存在過，他們已經記入了歷史。

通過攝像機，林鑫遭遇了父輩昨日的遭遇——《三里洞》，心靈的地震顛覆了作為畫家、詩人的藝術幻想，在埋葬父輩們虛空的墓碑前，他脫胎為一個卑微的，跪在黑色煤層上的大眾的兒子。

我們將這個獎頒給林鑫，不僅僅是頒給林鑫一個人，不僅僅是頒給他的一部作品，而是頒給整個獨立製片人這個群體，包括他們的助手，頒給他們不記功利多少年如一日，把鏡頭對準那些默默無聞、自生自滅，長期被社會忽視、遺忘甚至欺凌的弱勢群體，他們的影片記錄了這些群體的存在，他們的生活——悲歡離合、喜怒哀樂，他們的無助、無奈與期望。正如林鑫所說：“不管是欢乐还是痛苦，都无法阻止我对这片土地持久地注视”。

齊氏文化基金會也將對中國獨立製片人這個群體給予持久地注视。

## 林鑫答謝辭

感谢齐氏文化基金会授予《三里洞》第三届“推动中国进步奖”！

感谢齐氏文化基金会、福陸文教基金会的辛勤工作！

感谢出席颁奖会的各位嘉宾和工作人员！

尽管我做了种种努力，遗憾的是最终只能通过影像的方式在这里与大家见面——林鑫

## 一个纪录片人的生命旅程（节选）

——代“推动中国进步奖”答谢辞



生命的旅程，是一趟没有返程票的历险。在旅途中将见到什么样的风景，和什么样的人相遇，都是无法提前预知的。因为我根本无法预知我40岁时会写出一本诗集，并搁置了我从小喜欢并沉浸其中二十余年的绘画，义无反顾地跨入到一个我完全陌生的领域——纪录片的拍摄和制作。几年过去了，先后做出了一部短片和两部长片，一部新片还在制作中。

生活在继续，每日依然在生存的奔波和精神的流放中度过。艺术理想和现实生活的巨大落差，依然重重地压在肩上。就在我以为随着年岁的增长激情不再，棱角已被磨平的时候。一行行诗句不断地从胸中涌出，带着难以磨灭的童年、煤矿的记忆以及生命中无法越过的那些时刻。再一次揭开了长久以来压抑在心灵深处的创痛。半个多月，不分昼夜写下的100多首诗歌，成为生命的一个驿站，那是2000年的夏天，我刚满四十岁。后来选出119首，出版了诗集《噢！父亲——黑色的记忆》。

生命中有些东西注定会与你相遇。我拍纪录片的缘起就是这样充满着偶然或者必然的契机。2003年的一次陈炉之行，使从未摸过摄像机的我，在内心的驱动下不顾一切地借了摄像机，试图用影像记录下日渐凋零的活化石——千年陶瓷古镇陈炉。制作中遇到的诸多难对人言的苦闷，使影片几经周折。虽然做的如此艰辛，影片却是唯美的。依然有着浓郁的艺术情结。一开始便确定了要制作一部实验性的纪录片。将文献、实验、记录融为一体。那毕竟是步履蹒跚的第一步。

《三里洞》，这是一部我注定无法坦然面对得影片，因为它深深地根植于我生长于斯的那片黝黑无望的土地。父亲过世时我还年轻，带着无知无畏义无反顾地走向未来，那时还来不及停下匆匆地步履，转回身面向父辈的命运和生命。等到我自己也做了父亲，也为生存不得不作出诸多妥协，并体验了无数的尴尬和无奈之后，我才一步步体会到父亲在面对命运时所表现出的沉默。作为一个晚辈，我试图了解他们的故事，一个个寻找着这些幸存下来并依然生活在这里的老矿工，聆听他们被岁月磨平已波澜不惊的讲述，那尘封已久的一段历史为我打开。除了十三位口述者，另外两个已故者也在众人的诉说中浮出水面。开篇的第一个人物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黑暗深处，假如他不是作为三里洞煤矿第一例死亡事故，给他的同代人留下深刻的记忆，我们可能不知道他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作为大多数已消失的普通矿工一员，他的形象从黑暗和遗忘中复活。影片的最后一个人物，我的父亲朱永生，也一样由他工友们的口述重

建。两个已故者的形象没有出现在影片中。影片最后是荒草中父母简陋的墓碑，他们静静地长眠在故乡的土地上。这是一部几乎完全由口述构建的影片，与之匹配的大量矿区废墟的空镜，都是那个时代的写照。无论是选煤楼、井口、更衣箱、灯房，无一不透出昔日岁月的痕迹和矿工生命的气息。也是我童年无数次穿过并留下深刻记忆的所在。作为一个矿工的儿子，我所能做的，就是将这些记录下来，以此来寄托对父亲及其一代人的纪念。

从《三里洞》到《同学》，我的拍摄基本上采用了一种相对无为的方式，进入是直接的、被动的和随机的，从不试图干预和左右事件的进程和发展，只是尽我所能地跟拍。我无法让生活停下脚步，也没有权利为影片改变生活的逻辑。在这里，我是一个严格的写实主义者，对生活的真实抱有敬畏之心，也有着文献式的企图。

《生存三部曲》中已完成的《三里洞》和《同学》，都是群像式影片。是一群人，一个地域，一个时代的记录。第三部的主体素材也已拍摄完毕，即将进入后期制作。影片关注的依然是普通人的生命故事。另一部关于信仰的纪录片依然在持续地等待中。这些对我的生命来说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撑，只能是业余的。更多时候，我只是一个银行职员，每天按时打卡上下班，那是我的生存基础。



## 附：一个纪录片人的生命旅程

林鑫

生命的旅程，是一趟没有返程票的历险。在旅途中将见到什么样的风景，和什么样的人相遇，都是无法提前预知的。在我 20 多岁还在学习传统绘画的时候，曾经想过我 30 岁时的绘画会是什么样呢？无法知道。30 来岁所做的彩墨实验与声音装置，是 20 岁时的我不可能想到的。30 岁时想过 40 岁的作品会是什么样呢？不知道。因为我根本无法预知我 40 岁时会写出一本诗集，并搁置了我从小喜欢并沉浸其中二十余年的绘画，义无反顾地跨入到一个我完全陌生的领域——纪录片的拍摄和制作。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先后做出了一部短片和两部长片，一部新片还在制作中。生命的旅程还在继续，以后还会与什么相遇我依然不知道。

### 第一站：自画像

记得母亲告诉我，我是 1960 年 1 月 20 日夜里出生的。从未谋面的祖父，请人排了八字，说我缺木和金，于是取名林鑫。我的出生地是在西安往北几十里外的一座山区小城——铜川。这是一座移民城市，由于 50 年代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建设，一批批来自上海、东北等地的移民来到这座煤城。我父亲朱永生，也和他那 318 个同伴一起，从上海的建筑公司来到铜川三里洞煤矿。后来便在通风区做瓦斯检查员，直到临退休前去世。母亲去世比父亲早 10 个月，也是癌症，是在我刚结婚不久。26 岁的我作为家中长子，第一次切身体会到生命的脆弱。

在矿区度过的童年是孤寂的。印象最深的是傍晚趴在家中的窗户上，可以看到漆水河对岸的医院，幽暗灯光下闪烁的人影，像鬼魂一样来回地飘荡。应该是夏天，发洪水了，听见有人在喊，浑浊的河水中飘过杂草浮木，一个人被洪水冲走了，不断地被洪水淹没，又不断地冒出头来，后来听说，在下游被救了起来。小时候常常一个人蹲在家门口，注视着山边飘过的一片片白云发呆，两只老鹰在天空盘旋着，偶尔会俯冲下来，把谁家的小鸡叼走了。夏夜里躺在门前的凉席上，凝视着夜空，数星星。也和小伙伴们一起去追逐萤火虫。总是游行的队伍，装甲车，红旗，工人头戴柳条帽，手持棍棒、长矛。还记得葛登发当年赤裸着上身，敲一面大鼓的威风形象。不断洒下的语录传单，像雪片一样飞舞在游行的队伍中。武斗开始了，还有炮声，我们都离开房子，躲进对面的窑洞，不断有弹片落在院子里，有人飞快地跑去捡了回来，摸摸，还

是热的。每个小伙伴都收集了一沓沓的语录传单，样板戏是都会唱的，常常拾个破茶缸，点根蜡烛，便是李玉和提着号志灯的形象了。那时家里是贫寒的，常常不够吃，有一次因为少了两个馒头，父亲把我和大妹一起痛打了一顿，说：吃就吃了，不能说谎。后来大妹承认是她吃了才吧。父亲去世多年后，我和大妹在一起说起此事，大妹说她也没吃，只是被打的无奈，只好承认了。后来有人说，邻居有个孩子拿了，这一切都无从考证，只是当年生活的艰辛，被牢牢地记在心上。最近在山里拍新片，竟然和 40 年未见的一年级班主任张淑兰老师异地相遇，她对我已没有印象，四十年的岁月磨平了记忆，眼前这位发福的慈祥老人和当年美丽清秀的张老师已经找不到多少共同之处了。上学期间印象较深的是学工学农的劳动课，种过苞谷，当过锻工。初中放暑假则去修公路，后来在搪瓷厂、砖瓦窑干过临时工，也挖过防空洞。小学时常常到矿上的澡堂去洗澡。父亲下班的时间，我在入井口等他。看着上罐的人们每个人都是黑色的，只有眼白和牙齿是白的。我无法认出我的父亲，只是呆呆地看着人流不停地从眼前飘过。直到一个黑影走来拉着我，我知道，这是我的父亲。这样的等待有过多次，也深深地记住了这个父亲无数次出入的井口。后来我将工人上下罐的镜头放在了《三里洞》的片头。只是现在的拍摄已没有当年热闹喧嚣的场面，矿上已经破产了。印象中总是很少见到父亲，偶尔有空会给我们姊妹四个讲述《珍珠塔》和《玉蜻蜓》，也会在暗夜里用低沉的男低音为我们唱《伏尔加河纤夫曲》，他会作曲，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作曲家。不知道我和弟弟多年后酷爱音乐，是不是有着父亲遗传的潜在诱因。记得是一天深夜，我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来说父亲在井下受伤了，现已送到矿医院。我陪着母亲在空无一人的大路上走了很久才来到医院。父亲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看见我们进来，微微地点下头。我第一次看见，一向高大的父亲，脸色苍白无助地躺在那里。后来知道，瓦斯检查员一天要跑几十里路，父亲是从来不趴矿车的，那天或许是由于过度疲劳实在走不动了，第一次趴矿车的父亲被压伤了脚，后来还受了处分。1978 年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便想报名内招下井，作为长子，我没有理由在家里吃闲饭。从内心讲，也不想下井，也知道井下危险，但看着生活的窘境，心想只要家里生活能好一些，就下吧。父亲说：我在井下干了一辈子，不让你下井，哪怕找个临时工干。那一刻我明白了父亲的爱在深处。后来我离开了煤矿。一个童年的小伙伴，内招下井没几天，出了事故，死在井下。

高中毕业后，先在铜川书画社画商品画、肖像和广告。1980 年招到银行工作至今，先后做过宣传、会计等多个工作岗位，目前还在工会兼着出纳。工作之余，继续着自己的艺术理想。高中时已认识了由省美协下放到陈炉陶瓷厂的画家笱咏老师，跟他学习书法、绘画。也没有想到多年后，我拍的第一部纪录片是《陈炉》。接下来的日子，工作，读夜大，成立画会。怀着作家、画家梦想的诸位同仁，当年的海阔天空现在早已被生活的现实所修正，每个人都挣扎在自己的方寸之间，忙碌得无暇他顾。

后来没想到的是，我大妹的同学成了我的女友，这个从小便时常来我家玩拨弦琴，时不时从我这借走几本书的小姑娘，此时已婷婷玉立。无奈她父母反对，出于一种更为朴实和经济的考量，希望能为她找个司机，可以给家里拉煤。最后我俩选择了私奔。带着仅有的少量积蓄，开始了我们的新婚之旅，尽我所能给妻子买了新衣服，也给岳父母买了衣料，以求得他们的宽恕。我只买了一身外套，里面全是旧的。没有更多的钱可以给我的父母买礼物。我想以后回报他们的养育之恩。然而，没有机会了，这最终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我旅行归来，母亲病了，诊断为肝癌晚期，生命不会超过三个月。我和大妹陪着母亲到上海就医。在母亲病重期间，她给我讲起小时候外祖父给她买青梅的往事。我沿着晨雾，到处去为她寻找青梅。时时刻刻担心的，是大妹的婚期和母亲的忌日重叠。在那段痛苦、绝望和无助的日子里，我没有眼泪。送葬的时候，我干嚎了几声，泪落了下来。大妹的婚礼在母亲葬礼后的第二天进行。紧接着，临近退休的父亲被诊断为食道癌。在西安、铜川的医院，陪父亲走完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日子。父亲无声地走了，二十多岁便来到煤矿，工作了整整一生的父亲，临终前还欠了矿上五百元钱。父母亲的相继离世，留给我的巨大的虚空。内心极度虚弱的我，一个人不敢呆在家中。常常等妻子下班后我才回家。有半年多时间，夜里天天梦见母亲，在谴责我。内心最虚弱的时候，连妻子也无法告诉。现在能够坦然地说出，我的内心已不再虚弱。父亲去世后，小妹顶替招工

到三里洞煤矿的选煤楼工作，十多年后矿上破产，卖断了工龄，现在苏州打工。大妹婚后调回到江苏太仓老家，弟弟在复旦读到博士留校任教。姊妹四人，目前只有我继续生活在铜川，谋生之余，拍纪录片。

父亲去世两个月后，也就是 1987 年 1 月，我的第一次书画展在铜川举办。两年后在西安的陕西美术馆举办了《林鑫现代艺术展》，非乐器演奏的实验性音乐和绘画在展厅的地板、墙壁和空间中构成。在开展当天，4 件作品被勒令撤出。1993 年 8 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接下来的几年中，沉溺于西方音乐，从格里高利圣咏到马勒、勋伯格一路听来。有一段时间，对音乐的投入程度，超过了美术。

生活在继续，每日依然在生存的奔波和精神的流放中度过。艺术理想和现实生活的巨大落差，依然重重地压在肩上。就在我以为随着年岁的增长激情不再，棱角已被磨平的时候。一行行诗句不断地从胸中涌出，带着难以磨灭的童年、煤矿的记忆以及生命中无法越过的那些时刻。再一次揭开了长久以来压抑在心灵深处的创痛。半个多月，不分昼夜写下的 100 多首诗歌，成为生命的一个驿站，那是 2000 年的夏天，我刚满四十岁。后来选出 119 首，出版了诗集《噢！父亲——黑色的记忆》。

## 第二站：纪录片

### 《陈炉》

生命中有些东西注定会与你相遇。我拍纪录片的缘起就是这样充满着偶然或者必然的契机。2003 年的一次陈炉之行，使从未摸过摄像机的我，在内心的驱动下不顾一切地借了摄像机，试图用影像记录下日渐凋零的活化石——千年陶瓷古镇陈炉。制作中遇到的诸多难对人言的苦涩，使影片几经周折。妻子看我如此作难，竭力劝我放弃。我坦言道，这是我精神的产儿，即便是遍身血污，我也希望他能够出生。虽然做的如此艰辛，影片却是唯美的。一个 360 度的全景，和紧接着数十个陈炉人每人一句话的《自说》，用肖像特写的方式一气推出，展示了陈炉人眼中的陈炉兴衰和社会变迁。第二段《风骨》，试图记录传统陶瓷制作流程。严格按照生产程序，从备料、拉坯、刻花、烧窑、出窑等全过程，一一进行呈现。从备料的泥池裂缝局部特写画面中，我看到了中国书法的起源，那一个个形象生动的汉字造型，乃是来自大自然的启示。伴随的声音也都是自然界的风声、水声、人声和各种嘈杂声。即便是配乐，也都是在现场采集，来自他方的音乐在精神上不属于这片土地。第三段《风情》则在陶瓷的历史残片和当下的荒芜景观中展开，再现了这一方水土一方人。那苍凉的秦腔在黄土高原上回荡，古镇随处可见的罐罐墙被夕阳镀上一层金色。现在看来，我当初拍片时，依然有着浓郁的艺术情结。一开始便确定了要制作一部实验性的纪录片。将文献、实验、记录融为一体。那毕竟是步履蹒跚的第一步。

### 《三里洞》

这是一部我注定无法坦然面对影片，因为它深深地根植于我生长于斯的那片黝黑无望的土地。父亲过世时我还年轻，带着无知无畏义无反顾地走向未来，那时还来不及停下匆匆地步履，转回身面向父辈的命运和生命。等到我自己也做了父亲，也为生存不得不作出诸多妥协，并体验了无数的尴尬和无奈之后，我才一步步体会到父亲在面对命运时所表现出的沉默。作为一个晚辈，我试图了解他们的故事，一个个寻找着这些幸存下来并依然生活在这里的老矿工，聆听他们被岁月磨平已波澜不惊的讲述，那尘封已久的一段历史为我打开。除了十三位口述者，另外两个已故者也在众人的诉说中浮出水面。开篇的第一个人物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黑暗深处，假如他不是作为三里洞煤矿第一例死亡事故，给他的同代人留下深刻的记忆，我们可能不知道他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作为大多数已消失的普通矿工一员，他的形象从黑暗和遗忘

中复活。影片的最后一个人物，我的父亲朱永生，也一样由他工友们的口述重建。两个已故者的形象没有出现在影片中。影片最后是荒草中父母简陋的墓碑，他们静静地长眠在故乡的土地上。这是一部几乎完全由口述构建的影片，与之匹配的大量矿区废墟的空镜，都是那个时代的写照。无论是选煤楼、井口、更衣箱、灯房，无一不透出昔日岁月的痕迹和矿工生命的气息。也是我童年无数次穿过并留下深刻记忆的所在。作为一个矿工的儿子，我所能做的，就是将这些记录下来，以此来寄托对父亲及其一代人的纪念。葛登发、姚洪昌、王正祥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目前葛登发依然住在废弃的房子里苍老了许多，在影片中时常发出爽朗笑声的王正祥也已经去世；我姨夫顾龙祥也好久不见了，沈龙根我没有勇气再次面对他的目光。尽管有两代人的共同努力，生命中一些深藏在内心深处的伤痛，依然无法触摸。影片中一位老人讲到儿子的死亡时用了病故这样一个可以理解的原因，但事实的真相直到几年后拍摄《同学》时我才偶然得知，他唯一大学毕业在公安局工作的儿子，得知妻子红杏出墙后，竭力劝阻无效，最后举枪自尽。我震惊之余，也明白了他讲到晚年时一度说不下去时的悲伤眼神。几年前姑夫病重去世前，我去探望。他的兄弟拖着井下工伤造成的残腿坐在旁边，两人相对无言，长时间的沉默。我不知此刻这两个三里洞的老矿工心里在想些什么，只是感到室内空气压抑的令人窒息。我走出病房，看到了满山遍野盛开的黄色油菜花，在阳光下显现着无限的生机。我想起阿赫玛托娃悼念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句：“世间所有的鲜花都绽放了/迎来的却是他个人的死期。”

## 《同学》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讲完了父辈的故事，接下来讲述的是我们自己。这些 1978 年从三里洞煤矿中学毕业走向社会的同学们，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社会变迁和动荡，每个人的命运也随着时代的洪流起伏。我和同学中的多数虽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除个别外，也很少遇见。三十年后我拿起摄像机试图记录同学们的生活时，与他们的相遇也是随机的，滚雪球式的。收集的同学们的电话号码常常是第三个才能打通，也由此将拍摄的路径导入完全不同的方向。记录下每个同学当下一天的生活和其三十年经历的回顾，我切实感受到的是生存的不易。三十年的岁月沧桑，已将青春的容颜改变。有的同学，见面时我已经无法认出。他们之间生活境况的落差之大，也远远超出我的想象。由于我自身职业的局限性，拍摄不得不在休息日进行，所以二十多个人物拍下来，时间跨越了四季。原来担心会不会拍成同学们的星期天，大家都在休息。结果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存挣扎，双休日对很多人已成为一种奢侈的想象。也许我和他们既有同学这样一种身份又不在他们日常生活圈内的缘故，使他们能够坦然地向我敞开心扉，倾述出深藏于心底多年的诸多话语和故事。在拍摄中我也多次失去控制，和他们一起流泪。面对强大的充满张力的生活，我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微弱和无力。拍摄这部影片最终动摇并改变了我的生存观念，我不再是一个艺术家了。当我听到生活艰辛的清洁工最后说出对生活还是满意的一番话语，彻底颠覆了在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中我们早习以为常的对所谓幸福的定义。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都有自身的尊严，只是需要我们解除所谓知识的武装，俯下身去，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生命中沉重的呼吸。虽然同学们大都是矿工的后代，但大部分已不在矿上工作了，他们的生活领域遍及各个社会层面，也使我的拍摄具有了某种抽样调查的性质。片中不同段落的人物，会在其他的段落中交叉出现，使相对独立的章节之间有了呼应。没有刻意的安排，是生活本身所赋予。我想起了基斯洛夫斯基的《十诫》，但那是剧情片，是提前设计好的。在第六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上看到内藤雅行给《同学》撰写的评语中有“这是一部描写生存本质的电影”这样一句话，我才明白了多年来基斯洛夫斯基对我的影响有多么深，也最终启示我将始终无法确定的描写煤城铜川的矿工们及其后代生活的三部作品命名为《生存三部曲》。

在路上

《生存三部曲》中已完成的《三里洞》和《同学》，都是群像式影片。是一群人，一个地域，一个时代的记录。第三部的主体素材也已拍摄完毕，即将进入后期制作。影片关注的依然是普

通人的生命故事。另一部关于信仰的纪录片依然在持续地等待中。这些对我的生命来说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撑，只能是业余的。更多时候，我只是一个银行职员，每天按时打卡上下班，干些起草文件、支付现金之类的琐碎杂事，那是我的生存基础。

### 第三站：一点杂感

通过几部纪录片的制作，我从艺术唯美逐渐向生活本身靠近，最终成为一个写实的、纯粹的生活记录者。同时将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感想和思考记录下来，作为对自己的鞭策。

#### 独立

所谓独立，主要是人格和精神的完全独立。无论制作、选片还是批评，不依赖臣服于任何强权和垄断话语。独立并不意味着你的选择和判断是正确的，但毕竟发出的是自己真实的声音。在这片依然是文化殖民地的土壤里，真实独立的声音，难能可贵。

#### 两种纪录片

我所见到的纪录片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专业”的，影像语言无可挑剔，制作也近乎完美，但我感受不到制作者的生命和温度；另一种是“业余”的，影像常常显得粗糙和简陋，但充满张力。能强烈地感受到作者的肺腑和呼吸。我显然更倾心于后者。在看了无数影碟，视觉几近麻木之后，与这样的影片相遇，依然如荒漠中遇到的清泉。走向技术的成熟是必然的，但不可以阉割生命的激情为代价。

#### 职业和业余

当拍摄纪录片不再成为一种职业而成为一种表达，便摆脱了工业化的制作逻辑。也没有了依靠它谋生的压力。在当下中国的独立记录片普遍不足以为制作者提供基本生存保障的前提下，依然有一批批的作者不断地从四面八方的各个角落生长出来，只能证明这是一种来自于生命自身的需要，同时也正是这样一种力量，成就了这一时期纪录片的活力。在一个缺乏和拒绝信仰的时代，喧嚣浮躁的空气也不足以将个体的精神和希望全部扼杀。只要我们知道，曾有过特丽莎嬷嬷这样的人存在，我们的内心便不会感到绝望。“崇高”这个词也不会从词典中被彻底抹去。

#### 音乐和声音

尽管有些人做得很好，我依然排斥在纪录片中加入音乐，除非那是现场固有的，或来自现场的音乐和歌声用在片中不同的地方。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声音，本身是丰富的，足以支撑起现实的空间，比后期加入的第三方音乐更有说服力。

#### 粗粝和精致、

看到一些制作非常精致的纪录片，反倒使我对自己的粗糙的影像语言增加了一些信心。记录片的风格应该和其所拍摄的内容对位。一部描写上海白领的纪录片精致是恰当的，其生活的方式、品位和精致的风格相吻合；而一部反映黑砖窑童工的纪录片，粗粝乃是其准确的影像语言，并和其生活的质地相匹配。过度精致只会削弱这类影片应有的力量。表面粗糙的影像，并不意味着制作者的不经意。尽管每一个镜头都经过了精心的剪辑，影片的风格依然可以是粗糙的。

#### 拒绝安排，不要花招

从《三里洞》到《同学》，我的拍摄基本上采用了一种相对无为的方式，进入是直接的、被动的和随机的，从不试图干预和左右事件的进程和发展，只是尽我所能地跟拍。我无法让生活停下脚步，也没有权利为影片改变生活的逻辑。在这里，我是一个严格的写实主义者，对生活的真实抱有敬畏之心，也有着文献式的企图。我希望随机拍摄的同学们的一天，成为当下真实生活的切片。摆拍和介入，不是我的选项。即便是口述部分我也是随其本身所坐的位置，调整我的机器，而不会去随意摆布人物。他出现在自己的生活空间，和其周围的环境自相适应。拍摄中我也尽可能回避访谈式的问答，而由人物陈述出他的世界，我只在剪辑时加以浓缩。制作中力求简单有效，没有聪明和技巧，不要花招。

### 需要花朵，也需要荆棘

如果世界上到处都盛开着牡丹，那是令人绝望的。我们不仅需要牡丹玫瑰，需要山花野草，也需要荆棘。自然的博大，容得下各种植物的生长。希望看到更多不同的纪录片，带给我们共生的喜悦。

### 生活大于事件

无论事件如何重要，也只能是生活之一维，不管是政治的，还是其他的，都不能取代生活本身。着眼于局部不及其余的孤立审视，会使记录下来的影像显得突兀。我将努力地把获取的题材融汇到生活的海洋之中。如果能退后一步观察，一朵白云，一片树叶，无不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 喜欢的片子

曾一度沉迷于塔尔科夫斯基，其有限的几部作品，带我进入了一个澄明高远的境地。特别是那本《雕刻时光》，更是细细地阅读了无数遍，诸多字句刻入肺腑，给人以力量和信心。但我也渐渐地感到，塔尔科夫斯基的高贵，有着俄罗斯思想的深厚积淀，与我们当下的生存现实有着十分遥远的距离。而基斯洛夫斯基则有着和我们相同的生存困境和内心创痛。从《十诫》、《维罗妮卡的双重生命》到《蓝白红》，尽管已多次看过，每次重读都依然感受到刻骨铭心的刺痛。那种常常身处两难境地的尴尬和无奈，乃是我们每一天生活的真实写照，尽管他刻意剔除了一些日常生活的细节，但那种面对生存的挣扎，与每个个体的生命息息相通。十分喜爱基斯洛夫斯基的影片，在反复地重读之后，感觉到哪些美得令人心碎的画面，依然给残酷的现实蒙上了一层温煦的外衣。而这样的一种美，只能是一种精神的慰藉，现实中却很难见到。于是我和法斯宾德再次相遇，那种彻底的，将残酷的生活赤裸裸地呈现在你面前的影像，没有委婉和修饰。在那些类似舞台剧的清冷灯光下，生活的戏剧为你展开，尖锐得如同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在心脏上划过。曾经不太喜欢的法斯宾德，此时和我拉近了距离，因为他的生活和影片是合一的。直接、尖锐、残酷，没有温馨的慰藉，没有虚伪的装饰。在一口气看完他一系列的影片之后，是长时间的无语和沉默。

### 生命不能持久，艺术不能持久

“生命不能持久，艺术不能持久。”当年我读到伊娃·赫西的这句话时，还很年轻，依然满怀着艺术的梦想和期望。她带给我的震惊，在多年以后，也依然能感受到当初心中掠过的那一丝悲凉。她虚弱的生命和那些脆弱的作品，始终记在心上。我已经活过了她 34 岁的生命，也活过了我母亲 46 岁的生命。依然在前行。只是抛弃了当年的艺术理想，两只脚更加坚实地踏在地上。

2009年11月于铜川新区

## 挖掘地下的黑色記憶 ——澳洲齊氏文化基金會第三屆頒獎紀實 齊家貞

2009年初，齊氏文化基金會開始醞釀2010年度的第三屆“推動中國進步獎”，我們注意到了近年來興起的中國獨立製片人，他們在恢復歷史本來面目，表現當代生活中太陽照不到的角落，特別是反映弱勢群體的真實境遇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不懈的追求。他們攝製的不少影片在海內外已經引起廣泛的關注，我們墨爾本的獨立中文筆會會員在2006年6月文革四十周年紀念會上，也放映過胡杰的《尋找林昭的靈魂》。影片的震撼力使我們意識到，中國民間製片人正以它全新的、堅實的、無可阻擋的腳步走向社會。

在近十八個月的醞釀、籌備過程中，基金會獲得許多獨立製片人和有關的專業人士以及海內外朋友的熱心參與和支持，我們搜集到許多好影片。入圍的作品除了林鑫的《三里洞》，還包括王兵的《和鳳鳴》、老驥的《孫醫生》、艾曉明和她助手謝貽卉等拍攝的《公民調查》、《我們的娃娃》，以及崔子恩的《我們是共產主義的省略號》等，這些都是製片人的心血之作，各有千秋、難分高下。經過再三討論，最後，決定將第三屆“推動中國進步獎”獎給林鑫和他的紀錄片《三里洞》。

第一屆、第二屆的頒獎典禮都是在澳洲墨爾本舉行，為什麼第三屆搬去了台灣？

2009年5月10日齊氏文化基金會第二屆“推動中國進步獎”頒獎，廖亦武出境受阻，由他的女友小金前來領獎。會上放映了廖亦武和小金地震採訪時拍攝的照片和汶川地震實況錄像。正巧，台灣福陸文教基金會的黃重生先生在墨爾本，他出席了頒獎會，與墨爾本來賓們一起目睹了齊氏文化基金會的所思所為，它的“中國很大，我們很小，但，我們心齊，願意為中國的進步做一點事情”的具體含義。黃先生深受感動，他當晚即拍板，由福陸文教基金會協辦，第三屆“推動中國進步獎”在台灣台北頒發。

同時，龍應台也答應“為齊氏文化基金會做義工”——頒獎。

我們如何能不深深感動，不深受鼓舞？

整個準備過程中，事無巨細，黃先生都作了周到詳盡的考慮。

所有從墨爾本、新西蘭、日本、香港、大陸來的二十多人到台北五天的交通吃住，包括旅館里每個房間具體名單的確定，早中餐食品的搭配和有各種特色餐館的選定，台北參觀的景點、台中的旅遊，龍應台基金會活動的參加，來去BUS或TAXI的接送，連下雨出太陽需要的傘也每人配備一把，連回家要在台灣買的禮品也從台中購買好送到旅店。

此外，六位大陸來賓入境台灣的申請事宜，是黃先生他們經手辦理。材料照片合格不合格，什麼東西需要補充需要重來，電話一個又一個，傳真發過來發過去，都是具體而微的瑣碎事，都很考驗辦事人的責任感和耐心。

對於頒獎會的一切，君悅大飯店的預定，司儀人選和台灣客人的邀請，菜餚的選擇，每位來賓餐桌的排定，頒獎儀式投射軟件的製作——精美、氣派、溫馨——都體現了台灣主人真心真意、真正的心血。

遺憾的是，受獎人林鑫經過幾番努力，還是不得不放棄前來領獎的計劃。嘉賓崔衛平，人到了香港還是沒有來得成台北。她在《我們唯一的敵人是專制》一文中說：“這次提出不讓我去台灣的理由是，有些人我不能見到，見了就會怎麼樣怎麼樣。好像他們是惡意傳染病菌，要採取某種隔離政策，我才能夠健康。”

七個拿到台灣入境證的客人，只有重慶的兩位老朋友、齊家最早的恩人晏長華和他的妻子秦雯到達現場。三十八年前在我母親逝世時，街坊鄰里無人敢表示慰問，他倆設法找來了薄木板為母親做棺材。

齊氏文化基金會第三屆推動中國進步獎於八月十五日傍晚在台灣台北君悅大飯店如期舉行。主持人台灣國光藝術學校退休校長周云鈞宣佈頒獎會開始。台灣福陸文教基金會董事黃重

生先生致辭。



黃重生先生致辭，右立者為主持人台灣國光藝術學校退休校長周云鈞。

黃先生說：“此次活動我們總共邀請了六位（共七位，崔衛平由龍應台文化基金會出面邀請）大陸的朋友，還有一位美國的朋友出席，但是因為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我們這次出席的只有兩位大陸的朋友。”“這次澳洲齊氏文化基金會策劃了整個的活動，台灣的部份是我們負責整個事務性的安排。中間如有不周到的地方，那絕對不是澳洲基金會的錯失，而是我個人的疏忽。請各位見諒。”

他的謙遜被聽眾用掌聲打斷，掌聲肯定了台灣方面所做的大量努力。黃先生繼續說：“我們期待隨著時代的進步，思想的開放，人權的彰顯，讓這些‘不可抗拒的因素’有一天能雲淡風清。那是我們的期待！”黃重生先生最後表示：“面對挫折，我們必須要學會微笑。今天我們的第一男主角不能出席這樣為他安排的一個盛會，那我們還是要讓這個活動辦得順利成功，告訴我們的第一男主角，告訴他：德不孤，必有鄰。”

齊氏文化基金會理事齊家貞介紹齊氏文化基金會緣起及宗旨。緣起：齊尊周（1912-1998）。中國海南文昌人。二十三年牢獄，大半輩子顛沛，為國家民主富強克勤克儉，盡心盡責。兒女忠孝，投資設非盈利的“齊氏文化基金會”，褒獎以文字推動中國進步者。既遂父願，亦順己衷。

宗旨：“中國很大，我們很小，但，我們心齊，願意為中國的進步做一點事情……”

基金會的資金來源是齊尊周的遺產，齊家貞用幻燈片介紹了齊尊周的一生：結婚、赴美、堅留大陸報效祖國、一家七口、重慶看守所、四川省第二監獄、出獄後在母親的墳前、第二次去美國打天下、亡故它鄉、骨灰歸國與母親合葬。



齊家貞介紹齊氏文化基金會，右坐者為王健壯先生。

接下來是齊氏文化基金會執行理事阿木（林明敏）宣讀頒獎詞。

會上放映了獲獎作品《三里洞》十九分鐘的片段。

司儀：觀賞了《三里洞》這個影片，使我們感覺到這個世界上苦難的人們為什麼都要通過紀錄片我們才能看到。什麼時候這個苦難才能脫離。我想，這都是我們將來要努力的方向。他並請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張鳴代替崔衛平發言：



頭一天，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思沙龍“你所不知道的中國”節目之一的“網路上的反對派——從草泥馬談起”，邀請崔衛平作《我是一隻草泥馬》的演講。由於崔衛平缺席，張鳴教授被邀請頂替崔衛平演講。所以，張鳴教授一開始就說：“今天我是來頂替崔衛平女士講評，這個事情還得做。最近，我已經成了一個頂替的專家了。”引得聽眾一片笑聲。張教授說：“作為一個唯一能夠頂替崔衛平講話或者是來頂替林鑫先生獲獎的這些大陸人，我必須得來。

林鑫拍的是好片子，獨立製片也是個好事，這個群體在大陸很不容易……有的揭示了過去的歷史，一些某些人不喜歡的歷史，揭示了一些看起來十分卑微的靈魂、卑微的生命，他們卑微到什麼程度？就是說，如果沒有人給他們記錄下來，沒有人提起的話他們就默默無聞地走過去了……獨立製片人的工作很難，他們的設備都很簡陋，很多人是辭去了自己的工作，還受到各種各樣的阻擾。我很不清楚很不解，為什麼像《三里洞》這樣的片子，有些人還阻擾還不愉快。有什麼不愉快的呢？這無非是已經發生過的事情，也無非把這些生命的狀態給我們展示一下。這有什麼關係呢？”“特別是，一旦他的影片被國際關注或是獲了什麼獎，他們就更難了。我們希望這樣的狀態不會再繼續下去，我們希望我們的言說更加自由，我們的拍片我們的影片展示更加自由。”

司儀宣佈頒獎開始：請頒獎人台灣博理基金會執行長也是大名鼎鼎的資深媒體人王健壯先生講話。

王健壯先生說：“張鳴教授代替崔衛平女士講話，我是代替龍應台……齊氏文化基金會去年第二屆推動中國進步獎是頒給廖亦武……廖的《底層訪談錄》和《地震瘋人院》他是投入現實去採訪的，林鑫是走回到過去，他的《同學》是拍他的同班同學同輩的回憶，《三里洞》是一九五零年代他父親那一輩從上海到陝西三里洞礦坑的記憶。一部片子是拍他父輩的記憶，一部片子是拍他同輩的記憶，看起來他好像是回到從前過去，事實上正好相反（它有現實的意義）。我們知道，一個社會，如果你不能夠對你過去的歷史有所掌握，如果一個社會或者一個政權，刻意的要讓一段記憶從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這些人的心目中消失的話，這就會像喬治的一本小說《一九八四》裏面的狀況了。林鑫的《三里洞》我看了，坦白說，很震撼。你們如果仔細看過這部片子，礦坑都是空鏡，人物就是這幾位，最後的人物朱永生那是林鑫的父親。回憶的力量有時候比現實的力量還要澎湃還要強大。尤其他這部片子，全篇用黑白呈現，非常感人。”“剛剛齊氏基金會講‘中國很大，我們很小’，容我冒犯，稍微把這句話調整一下，我把這句話改成：‘中國很大，我們很小，但是，那一些推動中國進步的人，他們比中國還大！’所以，我想，林鑫也好，前面兩屆得獎的也好，他們都當之無愧。不管過去的、現在的以及將來為中國進步可能有幫助的人，我們都向他們致上敬意。”“今天因為是代替我的好朋友龍應台來，所以我這個化身也要有專業的模仿，我願意把龍應台八月一號在北大演講中的幾句話念一下，希望各位聽我念這幾句話的時候，不要想像是王某在這個地方，想像是龍應台在這個地方。龍應台說：‘我們就從「大國崛起」這個詞說起吧。我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誰在乎「大國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剛才我所說的文明刻度——你這大國怎麼對待你的弱勢與少數，你怎麼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份子，這，才是我在乎的。’‘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裏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我用這句話向齊老師、向各位朋友致敬。謝謝！”

司儀：因為林鑫先生在中國陝西銅川，不能前來領獎，現在由也是獨立製片人，專程從日本前來的翰光先生代替林鑫領獎——獎狀。

獎金\$2000 澳幣將郵寄林鑫本人。



王健壯代龍應台頒獎，翰光代林鑫領獎。



翰光：今天好像頂替太多，連我也是第三個頂替者。

翰光講話：“我代林鑫表示謝謝！首先祝賀齊氏文化基金會頒獎順利成功。今天好像頂替太多，連我也是第三個頂替者。這說明我們齊氏文化基金會工作的困難，也是我們中國的特色。今天，我非常榮幸能夠代替林鑫接受這個獎。我也是獨立製片人，有這樣的巧合。林鑫是礦工的兒子，我也是礦工的兒子；他在銀行工作，我也在銀行。”“我與林鑫在 2005 年見過面，我們的片子在電影節上上映。我覺得林鑫與一般的獨立製片人有不一樣的地方，非常熱情非常有追求。見到我們這些同行，一般人只是高興呀，到什麼美麗的地方喝酒。林鑫說，我們大家來交流一下，交流拍紀錄片，怎麼樣拍好。他首先有這種精神。再有，他是個畫家，還

是個詩人，這是他獨到的地方，他能夠從一個畫家，一個靜態的畫到動態的畫，自己完成這種轉變，我覺得有他的天賦。”“林鑫和獨立製片和我們過去的（中國新聞紀錄片）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記錄我們底層人物，記錄平民百姓的人生。所以，這個工作很重要，同時，這個工作很辛苦……林鑫這兩個片子的光線非常暗淡，光線不足，除了礦山污染很重，還因為他拍片的時間都是在晚上，好像吃晚飯、睡覺前，他下班之後，他是業餘做的，白天是銀行八小時工作，銀行管人最嚴格。”“他做這件事，沒有助手，恐怕都是自己拍自己做，很辛苦，很費時間，而且不賺錢。”“現在，我們中國很多獨立製片人缺少經費缺少專業知識，我們希望社會關注。所以，今天我非常感謝齊氏基金會給獨立製片人林鑫發這個獎。”

頒獎會播放了林鑫“獲獎感言”的錄像。

七點半頒獎典禮結束，餐會開始，自由發言。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執行長李應平、台灣允晨文化出版社負責人廖志峰、香港《開放》雜誌責任編輯蔡詠梅、五七學社召集人凌文秀、《新天地》雜誌主編莫娜、記者王文君，台灣大紀元記者賴月貴、新西蘭《新報》編審周素子以及墨爾本的自由撰稿人阿森（吳森成），旅遊BUS公司經理高健和余世新，墨爾本文化人馬修等來賓作了即席發言。他們感謝台灣主人的盛情接待，感謝台灣各方面友人的參與。他們認為台灣中產階級對社會的回饋和對社會進步的支持應該是中國相關階級的榜樣，強調“一個進步的中國是全世界人民的福祉”。

臺灣自由時報、臺灣新新聞雜誌和臺灣大紀元報的記者對本次頒獎進行了採訪。

此次頒獎會，儘管有遺憾，但在各方人士的積極努力下，盛大、隆重、圓滿地舉行了。

正如黃重生先生所說：“面對挫折，我們必須要學會微笑。”也正如張鳴教授所說：

“面向未來，我們還是微笑吧，不要總是生活在悲愴裡頭。正因為這樣，我們才要推動這種片子的拍攝。”

（所有發言記錄，筆者略加整理，2010, 9.）



頒獎會第二天，台灣主人和來自大陸、香港、新西蘭、澳大利亞的來賓們在參觀鄭楠容基金會時留影。